

# 河南教育厅一处长因贪入狱 行贿者照样做官

## 专家呼吁建立判决书送达行贿人所在单位纪检部门机制

本报记者 李林  
实习生 苏孟迪 项云康

一座新校舍的建成，与一桩行贿案扯上了关系。但记者发现，受贿者虽入狱，多数行贿者却未被追究。

牵扯行贿的，是河南省伊川县的上天院小学。2013年10月30日，本报刊发文章《一座与“行贿”有关的新校舍》，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河南伊川县县委宣传部、伊川县纪委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于没有收到判决书，因此“不清楚有本县公职人员牵涉到该案中”。伊川县教育局局长王瑞卿、副局长李校立等人仍担任原职，未受到任何处罚。

纪检部门回复“不知情”，行贿人员未受罚

2012年12月18日，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河南省教育厅原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副处长冯哲有期徒刑15年。2013年3月15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2013年1月17日，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对冯哲案一审判决予以网上公示。判决书中明确列举了冯哲被审理查明的45起受贿事实，成为认定冯哲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据。

洛阳中院负责终审的主审法官孔海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终审判决中，一审判决书中的10项受贿事实，因证据不足没有被认定，最终认定的受贿事实为35项。

在这35项受贿事实中，上天院小学是其中之一。

该案一审判决显示：“2010年11月春节前，为感谢冯哲为伊川县上天院小学拨付校舍改造资金提供的帮助，伊川县教

育局局长王八×和副局长李十一×在省教育厅停车场送给冯哲现金2000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这35项受贿事实，涉及了河南省12个市、共计50名行贿人，其中不乏县教育局局长、县教育体育局教研室主任等国家公职人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一些行贿行为因数额较小、情节轻微，虽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但还是应该受到行政和党纪处罚。”

记者致电联系了12个市的纪检部门。取得联系的8个市纪检部门均回复，并不知晓本市有公职人员涉及冯哲案，因此没有对行贿人员作出处罚。

河南省鹤壁市纪检委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并称没有收到相关判决书，不了解情况。“异地审理案件的判决书不会送到鹤壁市来，我们也就不清楚有谁参与了行贿。”

焦作市纪检委宣教室工作人员也表示：“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也没人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就冯哲案判决书中所涉行贿人员的工作现状及追究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即便达到这一标准，也不乏“带病在岗”或未被处罚的情况。

冯哲案判决书中显示：“在2011年春节前，鹤壁高中校长翟××为感谢冯哲在下拨资金过程中给予鹤壁市鹤壁高中的关照，在冯哲办公室送给冯哲现金4万元。”记者拨通了鹤壁高中的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翟××一直担任该校的校长职务，近年来未听说人事变动的信息。

判决书还披露：“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焦作四中校长李一×为该校争取资金找冯哲帮忙，李一×为感谢冯哲在拨付资金中的关照，分3次送给冯哲现金3.4万

元。”

但根据“河南教育网”的报道，自2007年起，李某开始担任焦作四中校长，并兼任该校党总支书记。目前，焦作四中的官方网站上，李某依然担任该校校长职务。焦作四中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这点。

判决书披露，行贿的有县教育局局长。“2007年，桐柏县教育局局长马××为该县高中争取资金找到冯哲，冯哲答复需到教育部活动并需要经费，2008年春节前拨款40万元到后，马××派会计孙凡学和司机姚××到郑州送给冯哲现金6万元；2009年该校再次向省里申请校舍维修资金，在拨款到位后，在2010年3月，马××和司机姚××一块到冯哲办公室送给冯哲现金6万元。”

桐柏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马局长因年龄问题已于两三年前退休，不清楚是否受到处罚。

判决书披露：“浙川二高校长王十一×多次向冯哲提出让在资金上给该校予以照顾，在2008年年底冯哲通知该给其拨款40万元的项目款，并提出其中花费费用1.7万元，王十一×于2009年2月，送给冯哲现金两万元。”

浙川二高的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3月，纪委曾找校长谈话并批评。

该工作人员认为没有追究的意义：“这就是来回跑的一个费用，这是正常工作啊。这种情况都是为了工作，又不是装到个人腰包。”

此外，行贿的还有舞阳县的学校。“在2010年10月，为感谢冯哲在给舞阳县三高拨付资金过程中的关照，时任舞阳县三高的校长关××、副校长董一×及会计董二×在教育厅地下停车场内送给冯哲现金两万元。”

记者与舞阳县三高取得了联系，工作

人员确认了现任校长是关校长。但当记者询问关校长在“冯哲案”后是否受到惩处时，对方回答“我是从外面过来的”，并随即挂断电话。

此外，对于涉及行贿的光山县第二完全小学正副校长、光山县白雀园镇张寨村支部的处理问题，记者电话询问了光山县纪委。

光山县纪委办公室主任徐主任表示，因为没接到也没看到过相关的文件，对这件事不清楚，并表示如果接到上面的相关文书，“该给怎么处理的肯定要给处理的”。

“没有判决书”让行贿者逃脱处罚？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为何没有对行贿者进行查处，多个市纪检部门表示，因为没有收到判决书，所以不知道有本市公职人员涉及行贿，也就未对其进行查处。

但孟津县人民法院负责冯哲案一审的审判长陈新安表示，按照相关规定，法院没有义务向行贿者所在单位及纪检部门寄送判决书。

孔海建也表示，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法院只需要向公诉方、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送达判决书，如果被告方是国家公职人员，则需向被告方所在单位纪委寄送判决书。

记者随后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据工作人员介绍，按照一般的程序规定，法院会将判决书寄送给原告、被告和代理律师，但证人不是法律规定的必须送达主体。

今年5月，河南5名官员被查出“戴罪任职”，最长达3年，其中两人还获得升职。

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戴罪升职”事件后，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一项内部规定，要求要向职务犯

罪的被告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送达判决书。

规定出台后，河南省高院不仅会将判决书寄送至案件的原告、被告，还要将判决书向职务犯罪的被告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送达。

“但是向证人所在单位和纪检监察部门送达判决书，目前还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定。”该工作人员坦承，“目前不是硬性要求。”

“法院主动寄送，这不符合常理。”孔海建说，“纪委如果要对行贿者进行处理，应该由其主动向法院索要证据材料和文书作为参考。”

河南高院另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证人是作证的，法院是针对原告和被告发的判决书，并不是针对证人发的。法院没有义务向证人所在单位和当地纪委送达判决书。”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委会副主任许兰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对类似受贿案件牵扯出的行贿者，其查处工作主要依靠纪委“主动关注”。

但孔海建和陈新安均向记者表示，目前，还没有行贿者所在地的纪检部门来要过相关证据材料和文书。

“如果纪检监察部门知道消息，主动到法院和检察院来了解，法院和检察院就会做详细的介绍。”洪道德说，“如果纪委不主动，这个事情很可能就过去了。”

专家建言：健全判决书送达机制 提高行贿成本

事实上，行贿者逃脱惩罚早已不是新鲜事。

今年9月，有媒体报道，张家川一名中学生因在网上发帖“造谣”被刑拘。该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随后，就有网友意外发现，该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早在1

份1月的判决书中已被认定存在行贿行为。该事实被曝光后，“带病在岗”的白勇强被停职。

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说：“目前，对受贿的案件惩罚比较多，但是对行贿的案件判处要轻一点。”

原因何在？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认为：“现在虽然已经加强了对行贿人的打击，但行贿人需要出庭作证，作为污点证人，对他们的处罚往往会比较轻微。”

我国《刑法》第390条也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除了有“污点证人”的身份作保护外，许兰亭表示，由于目前没有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行贿者的单位及纪检部门”，纪委就难免因“不知情”而“不处罚”。

针对这种情况，洪道德呼吁，应弥补这一漏洞，建立将判决书送达行贿人所在单位及纪检部门的机制。

他分析，法院作为一个审判机关，应该被动办案，而不是主动办案。“因此，向行贿者所在单位及纪检部门送达判决书的责任，应该由检察院来承担。”

“检察院和纪委之间，联系很紧密，纪检监察部门一旦主动发现了违法事实，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理的同时，会把涉嫌犯罪的部分移送至检察院。”

洪道德指出，按照目前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作出提起公诉决定的时候，才需将涉案人员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而针对起诉案件中的其他涉案人，“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检察院和纪委间的逆向工作流程。“人民检察院在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案侦查以及审查起诉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涉嫌违纪违法，还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这一部分人的违纪违法行为为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去处理。”

肖云忠还建议，纪检监察部门应建立一项行贿人“行贿行为”的披露制度。

“就像公民的诚信档案一样，在打交道之前，公众可以查阅这个人有没有行贿记录，了解他受到过的惩罚。”

“这一举措，能够让行贿人的代价变大，削弱行贿人的动机，并有助于公众实行监督。”肖云忠说。

本报记者 庄庆雪  
实习生 杨雪

11月15日这一天，天气很寻常，陈香挤在北京下班晚高峰的地铁上。手机突然响起，那头是丈夫激动的声音：“老婆！我们能生两个娃啦！”

这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就此启动。

“生还是不生？”这个新生儿的问号，近日被抛进了上千万个中国家庭里。

单独家庭的经济账：“城市里，养不起”

陈香今年33岁，孩子已5岁。丈夫是独生子，而陈香不是，这个家庭正是政策的覆盖对象。

比起丈夫对“单独二胎”政策的欢迎，她则不打算要二胎。虽然丈夫是某外企经理，两人月收入共两万多元，但她依然直言：“因为养不起。”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在大城市，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到底是多少？

在宝宝还不到一岁，陈香就算了一本经济账：“几个月的婴儿，每月基本花销起码在3000元以上。”

“宝宝吃国产奶粉，每个月4罐大概要1500元。尿不湿需要500元。给宝宝吃的鱼肝油100元。换季的时候，衣服买的比较多，大概四五百元。另外还有一些清洁用品、器具的花销。”

这样的成本账，不只存在于特大城市。陈香的弟弟住在昆明，孩子现在一岁，花销也不比北京低。

“我们是网上买的德国奶粉，130元/罐，每个月孩子要吃5罐，需要650元。尿不湿大概200元。小孩子长得比较快，每个月都得买三四件新衣服，花费700多元。玩具平均每月花费500多元。如果孩子生病，去医院一趟下来就要700多元。如果女儿不吃奶，还得去做推拿，一次要150元，一周三四次。”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他询问周围的朋友、同事，得到的结论是，在昆明，月收入4000-1万元的家庭，养孩子的支出多在3000元这个额度左右。

大城市的房价、物价压力，也拉低了人们的生育愿望。

陈香的同事小王，女儿刚一岁，符合“单独”条件的他也不打算生二胎。“现在我们住的是一室一厅，等到孩子大了，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还要攒钱换大房子，没有能力再承担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用了。”

伴随着现代育儿观念的流行，早教机构日益火爆。市场吞噬的不仅是孩子的童年，更有年轻父母“赶不上CPI，赶不上房价涨幅”的收入。

为了增强体质，陈香的小外甥上了游泳班，“一个星期4次，一次60元”。现在，他们还报了“亲子班”，一年48个课时，共交1.1万元。

这样算下来，孩子一年的花费就要5万到6万元。“因为报了亲子班，这样的年花费在昆明算比较高的，所以每个月，父母还会给我们家补贴4000元左右。”陈香的弟弟说。

当孩子上学后，花销就会减少了吗？

“养不起，累不起，伤不起”——

# 单独家庭的“二胎成本账”

现在，陈香的孩子在某公立幼儿园上中班，每月学杂费1500元。“这样的花费在北京算很便宜的，但是上幼儿园我们还交了3万元赞助费。所以大概三年的学费是6万多元。”

她还给孩子报了英语班，18次课，3500元左右。“这只是第一期，一年念下来得1万多元，但其他家长都报了，我以后也准备一直报下去。”

此外，城市孩子的玩具、衣服，一年各得花“小一万元”。“比如这次双十一，我就给他买了点乐高玩具，两个700多元。现在天冷了，一件小孩羽绒服也一千多元。”每年孩子生病的费用，估计在3000元到4000元。

这样算下来，在北京养一个5岁的小孩，一年需要8万元左右。“这样的费用在北京并不算高，只是中等水平。”陈香说。

单独家庭的精力账：“两个娃，累不起”

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披露，“单独二胎”政策对城市育龄人群的影响相对更大，因为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农村，独生子女的比例并不高。

但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前期调研中，城市家庭生二胎的意愿却相对较低，约占60%。这一比例在农村则高达80%以上。

除了考虑高龄产妇的因素，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许多30来岁的夫妻考虑的不仅是经济成本，而是“精力、体力上吃不消”两个孩子。

陈香的周末，也完全是在“司机、陪读”的角色中度过的。

周六上午，她靠在芭蕾舞班的镜子边，看着女儿穿着粉红舞衣，和小朋友一起默默听老师口令抬腿、转圈。下午，她陪着孩子赶赴幼儿英语课堂，窗边挤满了抱着孩子外套的妈妈。周日上午，她守在绘画班的窗外，偶尔她还客串一把孩子们的模特。下午，她又得“提溜”着犯困的女儿，去参加她最怕的数学辅导班。

从南到北，众多城市家庭，共享着这样的亲子画面。

而陈香并非报班最多的家长，她的目的也不是压榨孩子。“主要是为了丰富她的生活，芭蕾是因为孩子自己喜欢才学的，其他的课程已经尽量少报了。学数学是希望让她开拓视野，让她知道摆小棍、算时间，并不指望她参加竞赛。”

陈香的大学同学李牧在苏州工作，现在女儿主要由婆婆负责“带”。他们家不想要二胎的理由是：“一个孩子就非常累了，老人已经是极限了。如果再添一个孩子，精力真是耗不起，又没有其他老人能来带了。”



“单独”可生二胎，中国将多生950万婴儿。

CFP供图

陈香对这个结论非常赞同：“现在哪里还能一个老人带两个孩子？一个孩子都恨不得要牵扯两个老人的精力。”

“在城市，凡是嚷嚷生二胎的，基本都是没要过孩子的。”带着开玩笑的性质，李牧如此断言。她孩子班上的家长，暂时还没人愿意生二胎。

一对要了二胎的双独家庭夫妻告诉陈香：“原本以为大孩子可以带小孩子，但没想到，实际上养两个孩子的精力完全是翻倍的，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单独家庭的观念账：“独生子女伤不起”

但陈香的丈夫王爽，却牢牢站在“支持单独家庭生二胎”这一边。

作为“独一代”，王爽认为独生子女太孤单了。“主要是为了孩子考虑，孩子能有个伴儿。”

因为“没有伴儿”，近二十年来，社会上对独生子女群体的“伤不起”，一直不乏批评之声。

“比起多子女家庭，通常独生子女的分

享意识、团队意识、抗压能力会比较弱，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独生子女一般受到的夸奖多，听到的负面信息少，自尊心比较强，进入学校和社会可能会受不了打击。”

但王爽也承认，不能把独生子女“一棒子打死”。“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时候，80、90后还是很给力的，还是比较能担当责任的。可能因为家里大人多，家务事不让独生子女干，所以他们的动手能力才弱，如果都放开手，让他们去做，也不会总是弱的。”

34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独生子女的“伤不起”。

“只有一个孩子”，让很多父母反对孩子涉足军人、警察等风险系数偏高的职业。王爽就认为，“如果能为国家做贡献当然好，但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独生子女的因素，除非他自己非要去当兵。”

频频看到“百万个失独家庭”的新闻，也是他想要二胎的原因。“那些40岁、50岁的父母，再生孩子已经不现实了。失去唯一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421”的家

庭结构，也加重了独生子女肩上赡养老人的负担。

王爽的母亲曾患病住院，那时就把他和妻子累趴下了。“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的孩子、去医院陪床，还要去看望爸爸，简直要把我劈成四半。那一阵子，我和老婆都是连轴转，我的体重一下子掉了10斤。”

因此，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面临这样“独木难支”的局面：“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就可以倒着班来。”

单独家庭的“观念账本”里，还有一个更尴尬的概念：“重男轻女”。

对房价高企的解读，早有“丈母娘经济”概念，全国不少地区，都存在“给儿子买房”的情况。这导致部分有女儿的家庭不愿意生二胎，以免生了个儿子之后，女儿“太可怜”。

“房子大都是买给儿子，但将来父母老了，是儿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我是独生女，结婚后，我父母赞助了我们买房。如果我有个弟弟，你想想我还能有什么？”李牧说。

庭结构，也加重了独生子女肩上赡养老人的负担。

另一面，“重男轻女”观念下，一些有女儿的单独家庭，顿时感受到了长辈希望他们“再生个男孩”的压力。

“‘生儿生女都一样’已经讲了30多年，希望更多爷奶奶辈的人能够真正转变观念，尊重子女的选择。”身为“70后”的李牧颇有感慨。

“观念需要一代人来改变”

虽然陈香不打算生二胎，但是她一样在当天晚上发出了一条欢庆“单独二胎”的微博。

“现在放开了政策，无论我想不想生，都可以自己选择，不再是国家明令禁止。这不一样，还是很有必要开放的。”

看到微博，王爽又试图说服妻子：“再生一个孩子，我们略微‘穷养’不就可以了吗？过去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不都可以带好几个孩子吗？”

但她反驳：“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了，孩子都养得很金贵，要讲究教育质量，注重孩子的习惯养成、科学喂养，更不可能长时间离开家长的视线。现在的城市里，你见过三五岁的小孩独自在大马路上的吗？”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经过34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加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的育儿观念也从“粗养”一步步走向了“精养”。

对于一个老人看不过来一个孩子，李牧深有体会：“老人看孩子，真的比较累，有时候都吃不上饭。主要是怕孩子磕着碰着，现在不像以前住平房，街坊、亲戚能帮着看着点儿，放学后能在院子或胡同玩儿。现在住的都是楼房，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煤气、电都不安全。”

接送上下学，也逐渐从“争议话题”成为城市家长的“必需选项”。

“现在孩子都早放学，小学生减负了，3点10分就放学，父母都有工作的话，一般没有这个时间下班的。”陈香解释，“我们小时候流动人口少，谁家来外人都看得见，放心让孩子一个人自己走胡同、过马路回家。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车，谁家有车停在胡同里都算新鲜的了。”

李牧认为这并非小题大做，“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现在外面车很多，以前只有自行车。而且现在侵害孩子的负面事件、报复社会行为也不少，所以，孩子的安全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精养”的教育观念，对于单独家庭也有“不得不从”的无奈。

实际上，陈香也不愿意让孩子这么累。这班那班，真的上不过来，但这是教育的大环境使然，大部分家长和孩子的节奏就是这样。你不学，别人学，就是“输在起跑线上”，甚至不是“赢了对方”。

她看到国外幼儿园的数学“就是玩”，而她孩子的幼儿园正好相反。“不但不能玩，上完大班，还得去学学前班，提前学小学的东西，你必须跟得上课程。”

“真的有必要所有人一起‘抢跑’吗？”王爽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他们隐隐觉得，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也许就是一个让更多国人转变育儿观念、“别那么紧张”的契机。

“观念可以改变，值得期待，但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陈香看着身边玩布娃娃的女儿，眼神明亮。

(文中均为化名)